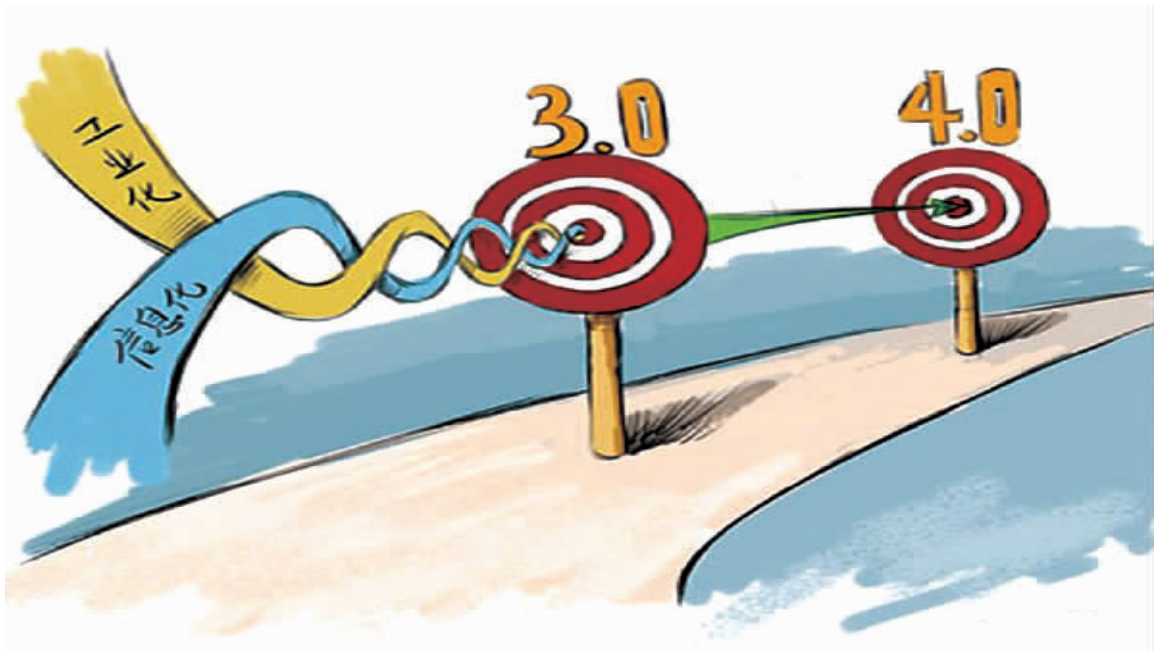
N 本期聚焦

德国提出的“工业4.0”，现在是一个热词。但是，德文原文的“Industrie4.0”，究竟该译为“工业4.0”，还是“产业4.0”？也许有人会觉得，译为工业还是产业，没有必要那么苛求，这里的工业和产业是等价的。但在全社会意义上，可能会引起误解。毕竟在很长时期里，我们所说的工业只是一个主要对应制造业的概念；产业则是一个整体性的概念，不是也不可能是仅指制造业。这不是一个翻译的问题，而是如何理解和把握产业演进、产业革命以及如何思考和推进产业升级、发展的问题。

产业4.0：农业和工业“去哪儿了”？

陈 宪



以色列前总统佩雷斯说，真正的农业“95%靠科学，5%靠耕种”。2015年举办的以色列农业科技展览会上，各家农业科技公司提供了什么？主要是这么几类：第一，各种解决方案，涉及农业科技、农业生产、农产品流通、农业工程设计和施工、农业设备安装和服务，甚至还有农作物种植和牲畜养育的大数据分析方案，以及工程、设备的融资或租赁方案，等等。第二，技术与设备交易。第三，工程承包，如滴灌工程建设、“智慧大棚”安装。在如今的工业科技展览上，大致也是这些内容：解决方案，技术交易和工程建设。所以，我们可以说“农业没有了”，再假以时日，也可以说“工业没有了”。这些当然只是现象。

从本质上看，“农业没有了”是技术进步条件下产业融合乃至全产业融合的结果。因此，这个现象要放在产业融合的背景下才能得到认知和把握。自工业化开始，农业和制造业的融合就已经开始，机械化的工具进入农业的生产环节。此后，电气化、信息化的工具和服务也陆续拥抱农业，直到今天在以色列看到的农业智能化，其实还包含着工业智能化、服务智能化。至此，在农业的产出即农产品上，土地和劳动的作用都显著地下降了，科技、服务、人力资本的作用显著地增强了。

这在美国那样的大规模农业国家、以色列那样的农业自然条件恶劣的国家，率先凸显出来。在其他国家包括中国，科技、服务和人力资本对农业的作用也程度不同地表现出来了。因此，农业就越来越像其他产业。之所以像，是因为有了共同的内涵，那就是信息化、智能化的技术和服务。由此可以发现，智能化是先由概念到解决方案，再到智能技术（包括制造技术和服务技术），进而形成为客户使用的智能化产品或服务。

自信息技术革命以来，产业发展的一个基本特征和趋势就是产业融合，农业、制造业和服务业相互渗透和融合。今天的农产品、工业品和各种服务，几乎都是在全产业融合中生产出来的，这意味着全产业融合将会从根本上改变产业体系。但是，由于用数据反映产业体系演变的统计体系总是滞后的，导致我们仍然按照农业、工业（制造业）和服务业来认识产业体系和产业发展。事实上，在国民经济信息化、服务化和智能化的背景下，一、二、三产业或农业、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分类，不仅不能充分反映产业发展内涵，而且会产生各种错误认识和政策。

第一次工业革命以前，农业单打独斗，历经数千年，进步十分缓慢。工业革命以后，农业生产工具和其他生产资料搭上工业革命的快车，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。尤其在大规模农业的国家和地区，农业劳动生产率得到极大提高。以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为标志的制造业发展，是在信息技术革命以后生产性服务业突飞猛进的裹胁下得以实现的。服务业一方面依赖国民收入提高，带来消费性服务业的发展；另一方面，随着分工和专业化水平的提高，生产性服务业成为异军突起的产业部门，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解释。

所以，三次产业的第一、第二和第三是序数词，本身就蕴含着产业演进的深意：首先是制造业提高农业的劳动生产率，其次是服务业（主要是生产性服务业）提高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，再次是以生产性服务业为关键变量，引发一、二、三产业的革命性融合，形成新的产业链、价值链架构，进而提高全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，全产业融合是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关键路径。在三次产业的框架中观察过去数十年的产业发展，可以发现，由专业化分工深化而逐步形成和壮大的生产性服务业，是成长最快、对经济增长和结构优化贡献最大的产业。

然而，过去的一个时期，我们对生产性服务业的认知存有偏颇，仅仅将它视作为制造业提供服务的部门。所谓生产性服务业是“2.5产业”的说法，就是这种认知的具体表现。其实，生产性服务业是一个为全产业提供中间服务的部门，农业和制造业都是其提供服务的对象，服务业自身更是其最大的服务对象。

（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）

来源：解放日报

观点集粹

舆论引领的核心是“价值竞争”

中共上海市委党校科社教研部讲师李宗建在《学习时报》刊文指出，“价值竞争”是“变革时代的主旋律”。新媒体不仅提供了信息充分流通的渠道，更提供了价值充分竞争的平台。社会舆论是大众意见的集合，支撑意见的是蕴含于其中的价值标准和价值选择，价值向度是舆论引导的魂之所在。因而，在媒体融合的新时代，舆论引导者要重拾引导的主动权和重振舆论的感召力，打通“两个舆论场”，就必须力求占领道义的制高点，将价值观传播置于舆论引领的核心地位。主流媒体必须在价值确认、价值创造、价值传播和意义挖掘、意义诠释、意义演绎等方面苦练内功，弘扬中国精神，凝聚中国力量，为人民群众释疑解惑，让中国声音赢得国际社会理解和认同，以价值追求的正义性形成最根本的说服力和动员力。

“法不禁止便自由”命题有缺陷

上海师范大学光启学者特聘教授、博士生导师刘作翔在《北京日报》刊文指出，“法不禁止便自由”是一个涉及公民行为自由界限的原则。但对这样一个原则，可能存在着认识上的误区。第一，这个结论成立必须有一个前提，就是法律必须把所有的行为模式都可以穷尽，并且已经穷尽了。但是事实上，法治再发达，也不可能把所有的行为模式、行为类型都概括，做不到这一点。没有这个前提，就不能说“法不禁止即可为”。第二，“法不禁止即可为”或者“法不禁止便自由”隐含的含义是，只要是法不禁止的行为都是可以做的，都是自由的。既然它是自由的，那它就是具有正当性的，就是具有权利属性的。但这一命题把法律之外的复杂的其他多种类的社会规范排除掉了。法不禁止的，还有道德禁止的，还有纪律禁止的。所以我认为，对于公权力，法无明文规定的不可行使；对于私权利，法无明文禁止的不得惩罚。我们只能提出不能用法律惩罚那些法无明文禁止的行为，但不能排除其他社会规范对它的一种惩罚。

提高对“金融治理”重要性的认识

国家开发银行行长郑之杰指出，纵观世界各国在从中等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发展的过程中，都会面临巨大的经济社会转型的挑战，其中，金融治理的重要性在此阶段起到决定性作用。中等收入陷阱源于中等收入经济体的经济不稳定，而经济不稳定则主要源于频繁爆发的金融危机。中等收入经济体之所以频发金融危机，是因为其经济与社会转型所引发的一系列结构问题。避免中等收入陷阱，关键在于防范金融危机：政治上，要建立强有力的支撑改革和审慎监管的体制；政策上，要及时、审慎地推进财政改革和金融改革；技术上，要实施宏观审慎监管，维持金融稳定，并建立有效应对危机和加速危机恢复的机制。

N 学者观察

评价社会进步的标准是什么？

沈宝祥

“社会”这个概念，有多重含义，最广泛的含义是社会形态，即封建社会、资本主义社会、社会主义社会等。我们这里所议论的，实际上正是社会形态。

制度决定社会的性质，制度也体现社会的性质。社会形态，实质上是社会制度问题。我们讲封建社会，就是要讲封建社会制度，讲资本主义社会，就是要讲资本主义社会制度，讲社会主义社会，也是要讲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。评价判断社会制度的优劣，衡量社会进步，需要一个客观的科学的评价标准。应当怎样评价一种社会制度的优劣好坏呢？我以为主要是看二条。

第一，要看在这种社会制度下，能否促进社会生产力的持续发展。

生产力是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，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。人们选择和建立某种生产关系，选择和建立某种社会制度，实行某种路线，作出某种决策，是为了更好地发展社会生产力，以解决自己的吃、喝、穿、住等问题。我们所以要建立社会主义制度，从根本上说，就是为了更快更好地发展社会生产力。因此，能否促进社会生产力的持续发展，应当作为评价判断社会制度的第一个标准。

历史表明，发展社会生产力与改善社会成员的生活，未必是正相关的。苏联在一个时期，社会生产力与科学技术发展很快，成为超级大国，但苏联人民的生活长期得不到相应的改善。我国的经验是，如果搞唯GDP，经济指标上去了，人民的生活，特别是人民的生活质量未必能改善。因此，评价一个社会，仅看社会生产力的发展，是不够的。

第二，要看在这种社会制度下，人的生存状态是否能够得到不断改善。

社会是由人组成的，人是社会的主体。一切社会活动、社会变革，归根到底，都是为了人的需要。人们发展生产力，有着明确的目的，就是为了解决自己的生存和发展问题。人们建立某种社会制度，直接目的是为了促进生产力的发展，但发展生产力又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和发展。离开了人的需要，一切社会活动包括生产力的发展，就没有任何意义，或大大降低了其意义。人的需要，首先是解决吃、喝、穿、住，提高生活水平，但不限于这些，实际上，人的需要比这些广泛得多，还有教育、文化、科学、艺术、宗教等方面的需要，还有参加社会活动和政治活动等方面的需要，人的权利和价值的实现，良好的生态环境和社会环境，等等。社会越发展越是这样。因此，我提出人的生存状态的概念。良好的社会制度，必须要保证人的生存状态不断得到改善。这应当视为评价判断社会制度的最高标准。

（作者为中央党校教授）

来源：理论视野

N 有此一说

延迟退休对青年就业影响小

郑东亮

近来，社会对延迟退休年龄议论颇多，担心延迟退休政策极大地影响就业。“老年人不退，不腾岗位，年轻人怎么就业呢？”然而，只要认真研究分析延迟退休的制度设计，就能发现它对就业的影响没人们想象中那么大。

从节奏上看，延迟退休将实行“小步慢走”而非“一步到位”，每年只延迟几个月，影响人数非常有限，不会对劳动力需求产生大的冲击，因此，对就业的总体影响小且缓和。

更何况，延迟退休并非所有群体同步推行，而是从目前退休年龄相对偏低的群体开始逐步实施。这一政策的推出时机，实际上充分考虑了我国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变化的状况。从2012年开始，我国劳动年龄人口逐步减少，2030年之后，减少幅度还将进一步加大。从2011年高峰期的9亿多，减少到2050年的7亿左右，劳动年龄人口减少的趋势，显然会和延迟退休对就业的影响，产生对冲效应。

实际上，劳动力市场的新陈代谢，远不是“老的不退休，年轻的别想进”。即使不实行延迟退休，有些行业、一些单位因为缺工，本来就有相当部分劳动者退而不休。根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，60岁—64岁的城镇男性劳动者还在工作的有近1/3，且从第五次人口普查以来呈提高趋势。因此，从总量上看，即使延迟退休导致老年劳动力留在市场中，并不一定就会减少年轻人进入。

老年劳动力和青年劳动力并非完全的替代关系，还存在互补关系。一些旧有的工作，年轻人未必“看得上”，同时也可能是“做不了”。这些领域的老年人退休了，不但他们所从事的工作没人做，甚至也会导致劳动力市场上的结构性短缺，使得一些工作没有足够的人能做。比如，我国健康医疗产业发展迅速，却严重缺少医生，缺少护理人员；还有一些工作没有足够的人愿意去做，比如养老服务业。可见，延退占用的就业岗位，和青年的就业愿景重合度不一定很高。随着技术进步、劳动生产率提高和产业结构调整，产生了许多适合青年进入的新行业或职业。在这个意义上讲，青年的就业机会，主要还是决定于经济发展和转型升级，以及青年群体的就业方向与能力。

随着受教育年限的延长，劳动者的工作年限实际上被隐性地缩短了，这将导致社会总体劳动力资源减少更多。而渐进式的延迟退休，是维持“人口红利”的一种方式。在产业结构提升、劳动条件改善的情况下，老年劳动者可胜任的工作岗位其实变多了，如果未老先退、能干先休，这是对社会人力资源的巨大浪费。对于劳动者而言，按照养老保险多缴多得的机制，退休金收入也不会有大的影响。

我们也应该看到，延迟退休对大龄劳动者特别是技能单一的大龄女性劳动者就业，有一定影响。为此，我们需要开发更多的适合岗位，采取有针对性的就业扶持政策支持这些劳动者就业，同时加强对大龄劳动者的权益保障。只有配套政策措施更完备，实施延迟退休政策的积极效益才能更好地释放出来。

（作者为人社部劳动科学研究所所长）

来源：人民日报

N 中外历史

孝道文化中的人性与政治

刘云生

春秋时期，郑国有个著名的政治家叫祭仲，他担任大夫职位，辅佐郑庄公，先后扶持庄公的四个儿子分别上位成为国君。郑厉公继任后，发现军政大权全部被祭仲控制，担心祭仲恃功而骄，不利于自己。于是就派遣了一个杀手暗杀祭仲。这位杀手就是祭仲的女婿雍纠。

不知何故，雍纠把谋杀计划有意无意地透露给夫人雍姬。雍姬特别纠结：一方是同床共枕的丈夫，一方是生养自己的父亲，到底该保护谁呢？想来想去，雍姬无法定夺，于是就回了趟娘家，问了母亲一个问题：对一个女人来说，是老爹重要还是老公重要？母亲立马作答：天下男人都可能成为你的老公，但老爹永远只有一个，老公哪能和老爹比呢？于是雍姬找到了老爹，告发了老公。祭仲立即杀掉了女婿，还将他的尸体摆出来示众。郑厉公悄悄收了雍纠的尸体，逃离郑国。车轮滚滚，郑厉公对着雍纠的尸体大发感慨：杀岳父这么重大的事，偏偏要去和女人商量，你死得活该。一对母女就这样战胜了国王和杀手，这是春秋历史上关于谋杀的冷笑话，后来还传下了一个成语：“人尽可夫”，当然意思完全变味了。

透过谋杀案的情节起伏，我们可以看到：雍姬的纠结和释然既是一种理性选择，也是一种文化选择。这种选择涉及中国文化的原点和核心——孝道。雍姬母亲的观点说明：妻子对丈夫，最多是忠贞服从，但对父亲却是孝道感恩；丈夫可以因为感情不和而离开，父亲却是一辈子的情感归属和伦理元点。

中国以孝治天下几千年，孝既是维护人伦的最重要依据，也是保持家庭和谐、社会稳定的最主要手段，所以从周朝开始一直到今天，国家、社会、家族都通过法律和道德两个方面进行强力约束。

孝的依据是什么？是天性和人情。父母养育、疼爱自己的子女，子女依赖、供养自己的父母这是有生命、有智慧、有情感动物种群的天性或者本能。纵观自然界，凡是违背上述天性或本能的动物种群都会自我消解，最终沉沦灭绝。天性和人情集中交叉到一点上，那就是极为可贵的爱。疼爱、关爱、怜爱，既是人类发自内心的深沉情愫，也是人类生生不息的最强大动力。如果人类群体中出现一类人，不关心自己父母，却异乎寻常地关爱他人，我们就称之为违背天性，不近人情。这类人只有两种：要么是大奸大恶，要么就属于高度智障。

公元前645年，齐国著名的政治家管仲走到了人生的尽头。一代霸主齐桓公亲自探视并且询问他有什么政治遗嘱，最重要的是谁能够代替他管理齐国。管仲反问齐桓公想找谁？齐桓公提到了管仲的好友鲍叔牙。管仲摇头否定，说鲍叔牙清廉自守，是非分明，容不下一丝污点；齐桓公又推荐了自己喜欢的三个人：易牙，杀掉自己儿子让齐桓公品尝了人肉的滋味；卫公子开方，背弃自己父母、祖国，连父亲去世都不回家，说是一天都离不开齐桓公；竖刁，自宫后贴近齐桓公。

管仲的结论是：这三个人的行为没有一个符合人性人情。如果重用这三人，齐国将会大乱。后来的结局不幸而言中，齐桓公舍不得这三位不近人情的亲信，后来被深闭宫中，活活饿死。管仲的逻辑推理是：如果一个人不爱惜自己、不孝顺父母、不顾及自己的国家，那他一定有着不可告人的巨大野心，这种包藏祸心的人，万万不可重用。

管仲的逻辑从人性出发，从亲情出发，侧面印证了孝道的人性基础。《孝经》的评价是“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，谓之悖德；不敬其亲而敬他人者，谓之悖礼。”——试想，一个人连自己父母都不爱不敬，绝对不可能去爱护、敬重其他人，否则就是悖德、悖礼。

（作者为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教授）

来源：深圳特区报